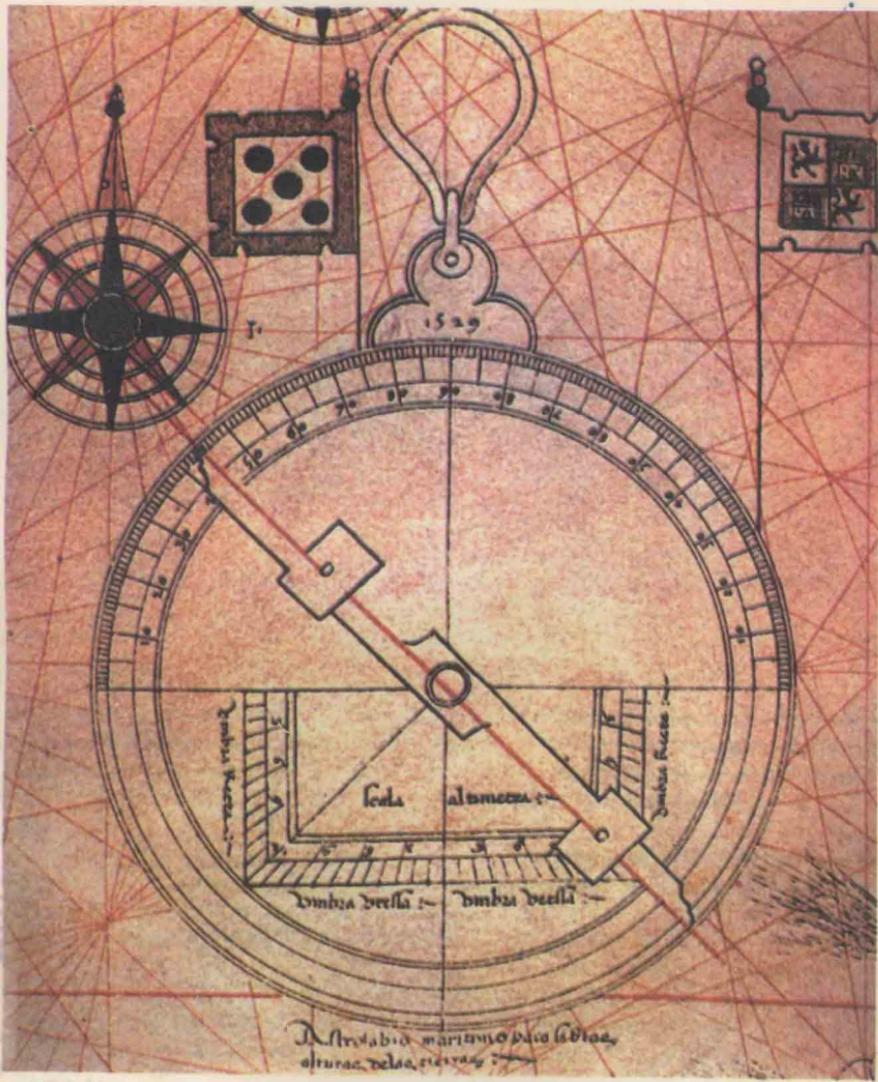


葡萄牙的发现

[葡] 雅依梅·科尔特桑

第二卷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葡萄牙的发现

第二卷

[葡] 雅依梅·科尔特桑 著

王华峰 张敬宾

译

吕银春 张书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葡萄牙的发现 第二卷 / (葡) 科尔特桑著 (Cortesão, J.); 王华峰、张敬宾等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7.

ISBN 7-5001-0444-8

I. 葡… II. ①科… ②王… ③张… III. 恩里克时期的发现 IV. K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0506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 话/66168195

邮 编/100810

责任校对/李鲜

合作出版/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

地 址/澳门南湾街时代商业中心十四楼 A 座

版 权/1980 年里斯本地平线丛书有限公司

排 版/五一照排厂

印 刷/北京顺义向阳胶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1.25

版 次/199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2 月第 1 次

ISBN 7-5001-0444-8/K · 21 定价: 12.00 元

雅依梅·科尔特桑曾设想以文明史为背景撰写一部巨著：葡萄牙历史。不幸的是，他未能如愿以偿，但他给我们留下许多与此有关的材料。显然，我们不可能评论没有写成的著作，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些零散的材料收集起来，尽量系统地加以编排，以便大体上了解作者对葡萄牙从古代起源到 18 世纪这一段历史的看法。材料中有许多段落不太容易理解，有些则需要充实，但所有材料都值得阅读，值得反复阅读、回味和思考。这不仅是因为每个章节都含有一种清澈的美，而且也是因为这些活生生的篇章是起程的港口，我们可以从那里出发去寻找我们的过去。

维托里诺·马加良斯·戈迪尼奥

(《葡萄牙形成过程中的民主因素》前言)

第三部分

恩里克时期

第 1 章

起源问题 世界性的社会与资产阶级国家

最近 30 年中，在葡萄牙展开了一项系统地修正我们将要研究的那个时期的历史渊源的工作，所进行的这种修正几乎总是集中在编年史和现存的各种关系上，而很少顾及葡萄牙的社会状况以及导致那些自身富于特色的事件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

309

虽然修正工作是必要而有益的，但由于一味地批判渊源，所以说这种努力犯了批判主义和对比倾向的错误。对于恩里克王子，出现了两种评价：一种观点认为，恩里克王子是一位学者，一个天才，甚至可以说是位圣人；而另一种观点则说他是一个极端愚昧的人，认为他智商平平，庸碌无能。前者的看法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处，后者的观点则粗俗有过。因此，那样一个所谓的发现计划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恩里克王子就没有想过它，无论如何，大部分航海家从来就没有继续实现寻找印度的设想，只有瓦斯科·达伽马找到了那块土地。

• 285 •

那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杜阿尔特·莱特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研究人员，有不少追随者。他是一位数学教授，知识渊博，虽不善于分析，却具有演说家的才能，因为他的语言水平很高。但是他运用了一些与历史研究不相称的精确科学的方法并且曾多次因采用粗暴和忌妒的争论方式而失去了历史学家的公正性。他所采用的态度是不适于探索真理的。

他作为否定学派的创始人，受到了曾与之争论过的许多人的称赞，这是因为他以某种复古的爱国主义精神对昔日的光荣采取了毫无批判的态度，但他缺少在历史上存在的那种人类的通情达理和社会的情感，因而也可以说，他缺少对各阶级和人民的共处及相互作用的认识。如果说，他的确客观地观察到了某些事实或者个人的作用，但却不善于将这些因素置于社会和生活的潮流之中。

虽然有这样一些保留，但公正地说，应该承认，他的著作虽不够全面，且有时自相矛盾，但仍不失为一部值得赞扬和富有生命力的作品；他的一些研究成果最终也被收入了发现史，这正是此书引证其作品的一些论点的原因所在。

从我们这方面而言，在不忽略对那个时代留给人们的少得可怜的文献进行研究的同时，在各类思想的起源中，我们将继续重视对集体思想方式的研究和对于基督教世界的共同意识观念状况形成的研究，这是第一次关注人及其在这个星球上的位置，也是为摆脱贫人或科学的、或宗教的权威所作的第一次尝试。当然，我们也认为前人的权威同样是一种源渊，它解释并证实了许多历史事实。

我们现在来阐述在民族扩张开始之前的那个时期 311
里作为基督教世界的葡萄牙的社会发展趋势；葡萄牙王国在那个时期内受各种内外因素的推动而迅速崛起的情况；曾鼓舞国家及其领导人的那种独特精神；最后，是地理、航海和政治文化的最终的相互适应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努力寻找以下将要论述的那些事件深刻的原因而不是表面的原因。

从 14 世纪前半叶起，葡萄牙社会就逐步形成了一种颇具世界主义色彩的经济结构和思想。在创建国家生活模式（以农业、鱼产品和提炼工业——如盐——为基础的远距离海路贸易）后，葡萄牙通过海路与西班牙、北非、佛兰德、英国、意大利的地中海港口和东方港口建立了贸易联系。葡萄牙自己也成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商人，其中意大利人，主要是热那亚人^①

①关于热那亚人，请允许我们在此介绍一下：佩萨尼亚人并未完全与他们的祖国断绝来往。他们这些自 1317 年就受到恩惠的人主要是在里斯本享有根据封建制度应该享有的权利。但城市委员会却多次对此提出抗议，直至堂·若昂一世满足了它的要求为止。1370 年，热那亚遭到葡萄牙的船只进攻，损失很大，就在这个时候，作为热那亚公爵、12 人委员会和公社的使节，若昂·佩萨尼亚一行人在尼科劳·戈阿绍陪同下到了里斯本，他携带全权证书，其使命是请求葡萄牙国王归还其臣民从热那亚人手中夺走的货物和修复那些被破坏的热那亚船只，这是 1370 年 6 月发生的事。几个月后，堂·费尔南多国王、热那亚公爵和公社签订了一项和平友好条约。根据该条约，葡萄牙国王答应对热那亚商人给予特殊保护，从而确认了热那亚人在堂·阿丰索六世王朝时期所享有的特权（席尔瓦·马克斯的著作，第 1 卷，第 124—134 页）。后来，在堂·若昂一世在位时期，当兰萨罗特·佩萨尼亚失宠之后，热那亚共和国便请求葡萄牙国王准许取代他所享有的恩典和海军上将的职务（请见《世界名人书信集》，由 F. 罗德里格斯·洛博搜集整理，里卡多·若热作序，科英布拉，1934 年，第 1—2 页）。

和西班牙人，大部分是加泰罗尼亚人和马略卡人^①，北方国家的人，佛兰德人不但数量多，而且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312

这些外国人中的许多人在葡萄牙定居，尽管他们继续与各自的祖国保持着有益的接触，但最终与当地人融为一体。自 14 世纪起，就有阿拉贡的伊莎贝尔及其随从人员，曼努埃尔·佩萨尼亚及他的热那亚随从，后来有英国人蒙德一家或莱梅斯一家、佛兰德人、巴托洛梅乌·弗洛伦蒂（他的姓可以说明他的国籍）、克里斯托旺·德阿罗、布加莱斯，葡萄牙可以说是超民族精神形成的范例，这种精神很早以来就开始在葡萄牙生根、开花、结果，使葡萄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

或许是由于同业已世界化的欧洲人的直接沟通，或许是因为那些与葡萄牙人有共同利益的外国人的加盟，一个主要以世界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资产阶级在葡萄牙形成并得以成长壮大，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这个新的具有扩张欲望的阶级最终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强加给了其他阶级，特别是本国的封建君主们。

313

众所周知，堂·费尔南多是那个时代的第一个兼国

① 关于阿拉贡人和马略卡人，这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我们将引证一个文献证实那些西班牙人的存在，并由此可以证明西班牙人在堂娜·伊莎贝尔·德阿拉贡时代在葡萄牙的影响。1362 年 8 月 1 日，堂·佩德罗曾发出过一封关于确认堂·阿丰索四世给予加泰罗尼亚人特权的信，加泰罗尼亚人是阿拉贡共和国和马略卡王国的臣民，他们曾在里斯本住过，当时那些享有上述特权的人不仅曾引证过上述信件，而且还断言：“很早以前，他们就曾是我共和国的居民，使用过共和国的商品”（席尔瓦·马克斯的著作，同前，第 1 卷，第 115 页）。

王与船主为一身的君主，他颁布了向海洋发展的法典，人们习惯于认为他是那部著名法典的倡导者和受益者。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其明智和自愿，而是受到了那些代表或分享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顾问们的影响。上述法典是为了保护一个阶级的利益及其生活方式的，但与法典的条款背道而驰，那个反复无常的君主为其垄断海运迈出了第一步，他决定，只要他的船队抛锚靠岸，其他船就不能再出租^①，这样的规定根本未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几个月之后，堂·费尔南多就不得不为了迎合英国商人的利益而对上述规定设了许多限定条件^②。

虽然堂·若昂一世沿袭了其兄^③的国王—船主的模式（当然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他的指导方针对一种集体意识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若昂一世登基不久就开始执行一项反封建政策，该项政策涉及到了船队的指挥

314

① 参阅《关于船舶出租公告的国王的信》，该信所涉及到的船只是属于国王或赠给贡萨洛·阿内斯的。信中这样规定：“当我们的船只停泊在那里并未被租借出去的话，他不得出租任何其他的船只……”。这封信写于1382年11月4日（席尔瓦·马克斯的著作，同前，第1卷，第180—181页）。

② 参阅《为蒙德和帕斯库亚尔·德阿斯帕及所有的英国商人颁布让他们享有特权的命令》，即这些商人可以租用他们愿意使用的船装运商品和物资，而不必遵守以前所颁布的只准租用国王的船装运商品的命令（同上，第182页）。

③ 大家知道有一份颇具说服力的信件，是国王致其财政大臣的（他负责管理国王的船只），这些船只是1395年至1404年之间在由热那亚前往佛兰德的途中在挪威沿海和阿维罗港之间损失和被抢的，当然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国王在这种商务中的代理人是他的财政总监若昂·阿丰索·德阿伦克尔（同上，第218—219页）。

和财产的民主分配，不论是科西嘉战争的战利品，还是海防保卫的费用都要进行民主分配。1388年6月3日的一个命令规定，不论是陆地还是海上的战利品均应在以下人员中分配：国王、舰队司令、船长、小船船长、要塞司令、向导、水手、弩弓手、小桅船船长、大帆船和舰船长官、士兵和皇家舰队的其他成员，在讲到上述这些人员时，堂·若昂一世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为我们效劳。”^①根据同一项政策，1397年7月下达了一项命令，对海防的费用作出了规定，这个命令规定，向里斯本及其周围地区的每个人征收1康托，用以装备一些战船来保卫里斯本、里斯本沿岸及其海防。此外还规定：由里斯本市政府官员，检察长和国王的地方法官及里斯本市委员会选出该市6名德高望重的人负责分配征收的份额，里斯本市及其周围地区的每一个居民都要交纳，国王、王后、委员会的成员及其他人均不享有免征权，但是寡妇和那些志愿参加作战的人员除外。

作为上述规定的必然结果，国王根据先辈的命令限制了佩萨尼亚人的封建权利，并最终取消了海军上将们的世袭封地。1361年在埃尔瓦斯法院的诸多上诉案件中，就有波尔图市委员会不满海军上将们所享有的停泊税特权的案例。葡萄牙公民曾指出，堂·佩德罗曾规定海军上将“可以从每条船收取一个金币，向其他较小的船征收半个金币”，这无疑加重了那个城市船只的负担，因为那里的船要比海军上将们的整个封地上的船只多

^① 同上，第190—191页，208—209页。

得多，这些负担最终落到了商人们的头上。国王满足了这个要求，他禁止海军上将向葡萄牙的船只征收上述税款，但是却允许他们向外国船只收税^①。堂·若昂一世显得更加坦率，在授予米塞·兰萨罗特的儿子米塞·卡洛斯海军上将职务证书时说，他这样做是应堂·努诺·阿尔瓦雷斯·佩雷拉统帅的要求，而不是因为要维护赋予海军上将之职的特权^②。1392年11月，他证实了堂·费尔南多以前致里斯本市委员会的信，通过这封信，他撤销了海军上将的封地，同时这也意味着取消了如下特权：在那块封地^③上的犯有罪行的难民可以不再被追究。

在堂·若昂一世在位期间，根据他的创议，葡萄牙在扩大甘蔗种植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显著的。堂·费尔南多大约在1377年向里斯本市颁布的通行征税法令（这是一份用以估价那个时代的葡萄牙贸易的重要意义及其发展的宝贵文献）中曾提及销往海外（如非洲的穆斯林国家和东方各国）的香料，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因为这件事是以法令的方式得到确认的，该文件中所涉及的香料毫无疑问是指产于葡萄牙王国的^④，但是在这个文件中却未直接提及糖，此外下述文件中还涉及到了senne，这是一种药品的阿拉伯名字，它也是与东方贸易的一部分；cofeima，我们未能查明其含义，但据说也是一个阿拉伯名词；另一种商品是红木，或称为巴西

① 席尔瓦·马克斯的著作，同前，第1卷的补遗，第37—38页。

② 席尔瓦·马克斯的著作，同前，第1卷，第210—211页。

③ 同上，第199页。

④ 席尔瓦·马克斯的著作，同前，第1卷的补遗，第51—60页。

红木，是一种染料，是从东方进口的。这些产品均要交纳什一税，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至于前面所说的香料（糖也属于此类产品），没有提及征收进口关税，而只是说明要征收出口关税。

316

经对上述文献的研究以及对一些征税证据的调查，可以得出结论：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人经常出入里斯本港^①。不论是上面那些文献还是直至阿维斯王朝初年的类似文件，都没有提及威尼斯人，然而众所周知，不论是热那亚人还是加泰罗尼亚人都曾大批地到过地中海东部和北非的港口，香料是他们当时的商品交易中最贵重的物品。只是在堂·若昂王朝期间才第一次出现了有关佛兰德的威尔士人的记载——正是他们这样一些商人把威尼斯和北海的海洋贸易中心联系起来，也正是在那时，才首次出现了葡萄牙王国希望将威尼斯的商业活动吸引到里斯本的尝试。

在对中世纪的糖业生产和贸易、特别是对葡萄牙和马德拉岛制糖工业的情况进行详细研究的过程中，杜阿尔特·莱特支持如下这样一种意见，甘蔗在葡萄牙的种植可以追溯到阿拉伯人占领时期，我们可以引证比利时历史学家埃米利奥·范登·比舍的文章的某些段落。这位历史学家指出，早在 1159 年葡萄牙就已开始种植甘蔗。他回顾说，据尼厄波尔特（佛兰德一个古老的沿海村镇）的档案中记载，葡萄牙的一艘船曾于 1194 年在该村镇附近海域沉没，该船是驶往布鲁日城的，船上装有

① 同上，第 81—82 页。

木材、油和“制糖的副产品”，此外还补充说：“葡萄牙很早就与佛兰德有贸易往来，这一事实证明，如果葡萄牙的糖根本不可能来自当时由摩尔人^①控制的锡图巴尔南部的一些港口的话，葡萄牙12世纪末就开始生产糖了。

如果说比利时历史学家的论断，至少是对糖输出的论断有某些疑问的话，那么堂·若昂一世所作出的一些涉及到国内和国外事务的命令，肯定就成了同一时代与该问题有关的历史性文献。在1392年6月26日的一封信中，国王对威尼斯商人作出了若干让步。堂·若昂一世在这封信中说，他获悉威尼斯商船曾途经里斯本海岸，但却未敢进港入城出售他们的商品，因为担心对船上的全部商品征收什一税，并在交纳全部货物的什一税前不准他们出港。堂·若昂决定，不对他们的船只在港口卸货施加任何限制；对船上的或卸下的商品免征什一税，也不交纳其他税款，但在里斯本出售的商品除外；他们也可以带自己的商品出港，只要经检查不违反由堂·若昂或其前任^②所颁布的任何禁令。

后来，也就是1415年之后，上述特权又扩大了，因为新的规定取消了1393年的命令中仍规定要征收的什一税。我们还掌握有那个时代的其他一些资料，这些资料证明，国王希望与威尼斯商人发展贸易并讨得他们的好感。众所周知，自1414年开始就有这样一种惯例：

^① 参阅杜阿尔特·莱特：《多变的历史事件》，里斯本，1941年，第218—230页。

^② 参阅席尔瓦·马克斯的著作，同前，第1卷，第197—198页。

^③ 参阅伽马·巴罗斯：《葡萄牙政府历史》，第4卷，第405—406页。

每当威尼斯商人途经里斯本港口时就会被邀请参加一个极为丰盛的冷餐会。只有威尼斯商人才受到这样一种款待。1414年，葡萄牙人赠给4艘威尼斯商船2000个白面包，8桶葡萄酒，16只母羊，40只绵羊，75包水果（分装了38个大筐），100担饼干^①。

318

叙述葡萄牙糖业发展的文献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是国王本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财政总监若昂·阿丰索·德阿伦克尔推动了葡萄牙糖业的发展。国王的这位总监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在任总监期间曾提出过许多发展糖业的建议。堂·若昂一世1404年1月16日的信曾数次被引证，也曾引起争议。在那封信中他下令清查其在夸尔泰拉（位于法鲁附近）的土地，他曾将这些土地赠给了“……米塞·若昂·德帕尔马，热那亚商人，我们的甘蔗种植者，他在阿尔加维王国有一位种植甘蔗的好手，这个人一定有……”。杜阿尔特·莱特根据上面这段话得出的结论认为，阿尔加维王国在1404年之前就已有了甘蔗田，而且不是葡萄牙唯一的甘蔗田；实际上，从国王信的上下文可以推断出，若昂·德帕尔马曾不止一次向国王抱怨他的甘蔗田遭受破坏的情况^②。事实上，国王于1403年在一封信中就曾提及阿丰索·阿内斯^③，他是国王的一个甘蔗种植者，于当年逝世。可以补充说，阿尔加维王国的甘蔗种植绝不仅限于夸尔泰拉的那片土地。1409年5月8日，国王交给了若

① 参阅伽马·巴罗斯的著作，同上。

② 参阅席尔瓦·马克斯的著作，同前，第1卷，第217页。

③ 同上，第216页。

昂·德帕尔马、他的儿子尼古劳·德帕尔马和弗朗西斯科·德帕尔马一份出租位于洛莱的一个菜园种植甘蔗的租约。

所有这些措施表明，国王有了新的考虑，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趋向，即独揽或分享与东方的贸易，其手段或者是将威尼斯商船吸引到葡萄牙来，或者是依靠热那亚的技术人员增加糖和当时价格昂贵的香料的生产以实现上述目标。

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扩张

在堂·若昂一世在位期间，香料已成为上层社会人士烹调的必需品，也许可以说，香料引发了葡萄牙上层社会人士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说有明显的迹象能证实这位国王对那个时代倍受青睐的香料贸易开始感兴趣的话，应该提醒人们注意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国家，即阿拉贡（更确切地说是阿拉贡联邦）和卡斯蒂利亚已经在或向东方、或向北非及大西洋扩张方面捷足先登了。

319

那时的伊比利亚半岛共有5个国家，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各半，葡萄牙占据西部，卡斯蒂利亚居中，纳瓦拉在北部，阿拉贡位于东部，格拉纳达伊斯兰王国在南部。

在这些国家中，任何一国都对其他几国构成不同程度的刺激，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它们在政治方面的相互影响。格拉纳达在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沿岸都建有港

口，并因其种族和信仰方面的关系自然而然与其邻近的非洲国家结成了联盟。可以说格拉纳达对整个天主教徒的贸易构成了一个经常性的威胁和障碍。卡斯蒂利亚不断地将其征服行动的矛头指向从中部高原到沿海广大地区，更加确切地说是指向南方。卡斯蒂利亚对其他国家来说无疑是个威胁，这也是促使其他国家结盟共同对付它的原因所在。对于葡萄牙来说，最迫在眉睫的威胁应该是卡斯蒂利亚。

13世纪至14世纪之间，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这些国家中，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在组建各自的舰队方面早已走在了葡萄牙的前面。事实上，13世纪可以被称为阿拉贡联邦海上扩张的时代。在这个世纪中，加泰罗尼亚人、马略卡人和瓦伦西亚人的舰队已非常强大，实力有时甚至超过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舰队。“征服科西嘉、萨丁岛、西西里以及在与比萨人、热那亚人、法国人和非洲人的海战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战果，都是加泰罗尼亚人海上扩张和其海军实力日益强大的标志”。贡萨洛·德雷帕拉斯（我们已在前面提到过他）指出，加泰罗尼亚于1273年击败了休达的海盗并攻占了这座城市，可以说是它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的第一批战果（休达原属于非斯王国，那时该国是阿拉贡王朝的盟友），随后又于1282年在尼科特拉大败法国舰队。在此之后的一些年中，法国舰队先在马耳他，之后在索伦托再遭重创，法国国王的海军主力最后在罗萨斯被全歼。就在同一时期，加泰罗尼亚在与比萨人和热那亚人的战斗中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在14世纪，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马略卡的海军在地中海上可以说是称雄一时。贡萨洛·

德雷帕拉斯指出，阿拉贡国王的势力一直扩展到了遥远的地方，应该说是这种扩张遏制了土耳其人的西进。阿拉贡国王还在希腊建立了一些公国，雅典公国就是其中之一^①。

小贡萨洛·雷帕拉斯提醒人们注意，在14世纪^②的阿拉贡王国中，犹太人，尤其是马略卡人在科技发展、特别是在航海和绘图技术的发展领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那一次确立了对加那利群岛的远征（堂·阿丰索四世致教皇克雷芒六世的信可作凭证）之后，1342年4月16日曾报道了要进行另外一次远征的消息。就在那一天，弗兰塞斯科·德斯瓦莱尔斯被任命为由“圣克雷乌号”和“圣马达莱纳号”两艘战船组成的舰队的指挥官，这两艘船的船长分别是P.马格雷和B.吉热斯。这个舰队的目的地是“福图纳岛”。远征队队长之职是由在该岛的马略卡国王的代理人罗热·德罗韦纳什授予的^③。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次远征曾付诸实施。据说，弗兰塞斯科·德斯瓦莱尔斯在去了一次鞑靼之后就再也无所作为。但在任命弗兰塞斯科·德斯瓦莱尔斯10天之后，多明戈·瓜尔也被任命为另一支远征队的指挥官，他指挥的那艘船叫“圣若昂号”，这第二次远征同

^① G. 雷帕拉斯：《现已澄清的西班牙历史混乱的篇章》，马德里，1927年，第71—72页。

^② 让我们读一下G.雷帕拉斯所作的令人感兴趣的研究：《阿拉贡王国在13世纪的航海和商业活动及其对马略卡人绘制地图风格的影响》，摘自《西班牙公报》第49期，1947年；《伊比利亚半岛14世纪的地理学和天文学及其起源》，摘自《国际科学史档案》，1948年。

^③ Ch. 德拉隆西埃：《中世纪非洲的发现》，第2卷，第7页。